



## 构建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

夏格旺堆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在青藏高原发现了超过5000处的不可移动文物、上百处史前时代的石器采集地点,经过科学发掘的史前遗址近20处,为认识高原人类生存技能、文化发展、历史演进、社会经济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

我们对青藏高原史前时代的年代范围有了突破性认识。西部阿里的梅龙达普遗址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出土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逾万件。中部堆龙的尚嘎岗遗址有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技术遗存,为解析早期人类探索和适应青藏高原的过程与生存策略等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北部申扎的尼阿底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的旷野石器遗址,光释光测年显示为距今4万—3万年。这些遗址的发现,勾勒了距今10万—1万年青藏高原腹地最早人群的生活图景。

青藏高原位于欧亚大陆中南部,历史上一直处于东亚、南亚、中亚文明的“十字交汇口”。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这里从来就不是“孤岛”一座。史前时代的遗存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几乎遍及西藏不同海拔、不同生态环境的地理单元。许多遗址中发现来自高原之外的粟、黍、滑石珠、青铜器、红玉髓和费昂斯珠饰等产品,证明史前时代高原上就存在广泛而通畅的流通网络,极大拓展和延伸了“史前全球化”的时间和空间尺度。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和科技分析显示,高原上的人群来源不是单一的,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一拨一拨”登上高原,人群的构成是多元的。藏文文献记载,藏族源由“四大氏族”或“六大氏族”形成,也强调了族源构成的多元性。人群不断“汇聚”的过程中,来自青藏高原东部的人群是形成“高原主体人群”的主要贡献者。

绝大多数人认为,人类很难在高寒缺氧的高原上生活,甚至将其称为“不毛之地”。这种认识的局限,一方面是因为大量藏文文献记录的都是7世纪吐蕃王朝创制藏文以来的历史,另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之前并没有发现更多史前遗址。如今,人类何时登上青藏高原,何时开始永久定居于高原,如何发展了适应高原的史前生业经济,独特的高原文明及其社会运行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正由考古学主导的多学科研究来逐步解答。

考古证据显示,距今10万—1万年前,西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高原狩猎采集人群,与周边人群有着密切联动。距今1万—5000年的高原各区域,广泛分布着掌握细石器技术的狩猎采集人群,开始使用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新石器时代玛不错遗址、拉顿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现了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区域史前人群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距今5000—3000年前,依靠成熟的粟作、粟麦混作、渔猎和狩猎、畜牧业的人群,开始永久定居于高原的各大河谷,高原最早的村落出现,文明的曙光已经到来。距今3000—1400年前,麦作和牛羊为主的畜牧业,成为高原的主要生业经济,考古学文化更加多元化,社会组织结构变得复杂,开始萌生实体政权。

距今1400年,青藏高原出现统一的吐蕃政权。吐蕃时期的温江多遗址出土大量带釉砖瓦建筑材料,以及陶器、泥塑、石柱础、铁器等遗物,表明这一时期青藏高原腹地与中原唐王朝及周边区域物质文化交流密切,为研究公元7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资料。

自2018年以来,西藏每年有8—10个重要考古项目被列入国家文物局支持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区系类型”“吐蕃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课题均有重大发现。这些新发现和研究,构建起西藏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脉络与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推动边疆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

## “英雄城市 抗战烽火”基本陈列对公众开放



日前,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英雄城市 抗战烽火”基本陈列正式对公众开放。展厅面积约400平方米,展线长度约230米,展览分为“共赴国难”“中流砥柱”“大江洪波”“敌后抗战”四个部分,通过文物、图片、复原场景、声光电多媒体互动等方式生动阐释“英雄城市 抗战烽火”的具体内涵。图为观众在展厅参观。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大汶口遗址:

# 文明曙光照亮海岱大地

发源于泰莱山区、西注黄河的大汶河,是黄河下游最大的支流。60多年前,一个远古的“秘密”被发现于汶水之畔的沉沉土层,显示出6000余年前大汶口文化的文明曙光曾照亮海岱大地。

多年来,依托丰厚遗存,山东泰安市持续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今年6月,大汶口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大汶口文化再度走进人们视线。

泥沙之下,器物纷呈,穿越6000年的历史烟尘,这里依然闪耀着先民智慧与文明进步的灿烂光辉。



今年七月,大汶口遗址考古队队员在遗址核心区发掘。  
新华社记者 朱峰 摄



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河两岸的大汶口遗址现存遗址范围38.9公顷,是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包括大汶口遗址博物馆、主题广场、遗址核心地带、滨河景观带、汶河北岸生产生活场景展示、聚落展示等部分。图为游客在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内参观先民生活场景复原模型。

新华社记者 朱峰 摄

### 曙光初现

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的田野间,考古工作者们正细致地清理遗迹上的土壤。这些遗迹来自约6100年至46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

现场考古队员介绍,自去年开展新一轮发掘工作后,新发现5座大汶口文化时期房址。今年,考古队正持续发掘新的区域。

记者看到,现场已清理出部分新遗迹。阳光下,新揭露的房址柱洞清晰可见,泥土中散落着陶器残片。考古队员手持专业工具细致工作,测量、记录、采样有序进行。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始于1959年的一次“意外”。当年津浦铁路复线施工时,泰安宁阳工地挖出陶器碎片等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抢救性发掘。

在大汶河南岸堡头村,133座史前墓葬重见天日,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象牙器等丰富器物出土,轰动学界。

“1959年首次发掘后,1974年、1978年又对大汶河北岸进行了两次发掘。”泰安大汶口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张保卫说,“三次发掘证明遗址涵盖大汶口文化早中晚各阶段。”后续工作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更发现了分布密集、规划清晰的早期房址,对理解该文化早期社会至关重要。

棉签轻拭,陶片上的泥土剥离,精美图案重焕光彩——走进大汶口,文物修复师俯身于工作台前,全神贯注地对文物进行修复。

“去年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豆以红褐陶衣为底,六组白彩八角星纹环绕器身。其纹饰构思与彩绘技艺,标志着大汶口文化彩

陶艺术的巅峰。”考古工作站考古技工刘相民说,自今年2月开始,考古工作人员又修复了100余件器物,其中包括陶豆、觚形杯、鼎、三足钵等。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文物不断出土,这片古老土地的故事也更加清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说,大汶口文化的发现,打破了之前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仅有仰韶、龙山两支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把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历史发展轴线向前推进2000多年,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不可缺的可信史源。

### 礼出东方

今年6月,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吸引了全球考古界的目光——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刊发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证实该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

傅家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距今约4750年至4500年。这项成果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社会组织,首次以分子遗传学证据实证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结构,刷新了母系社会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铁器时代的遗传学线索溯源时间。

人类早期社会从平等走向分化、由简单趋于复杂的过程,在墓葬制度变迁中清晰体现。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滕州岗上等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和贵族墓地的出现,是山东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键节点。

2016年起,山东大学发掘焦家遗址,其大汶口中晚期墓葬引

人瞩目:400多座墓中,70%使用葬具,包括百余座单棺墓、20余座一棺一椁墓及两座罕见的一棺两椁大墓。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墓地中极为少见。

考古学家认为,遗址墓葬呈现出较大的贫富差距,表明这一时期逐渐形成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

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内,一座长4.2米、宽3.2米的大汶口遗址M10复原墓葬昭示着墓主的昔日荣光。这位50—55岁的女性,双手握算牙,头戴77个单件组成的3串石质装饰品,随葬玉铲、臂环、指环及大量陶器——仅陶瓶就达38件。

《左传》载:“器以藏礼。”繁体字“禮”的右半边“豎”即为行礼之器。在大汶口时期,精美的陶器与玉器逐渐从日常生活用具,转变为彰显身份地位的礼器。

礼出东方,礼制是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夏商周三代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传统要素。

张保卫介绍,大汶口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附近地区,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其影响范围拓展到山东全境、江苏和安徽北部以及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覆盖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

### 守护共生

前段时间,由中国残联策划组织、北京市残联承办的“美丽工坊 绽放纽约”中国残疾妇女文创作品集亮相联合国总部。在展出的200余件作品中,大汶口花边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唐斌杰设计的花边伞和花边扇入选。

“这些花边伞用花瓣纹作为伞的周边基础纹样,这些是我从大汶口陶器的纹饰中找到的灵感。”唐斌杰说。

唐斌杰把大汶口陶罐上的几何纹、花边纹、网纹、三角纹、八角星纹等融入作品中,设计生产工艺伞、扇、桌布、服装材料等,产品销往欧洲多个国家,去年销售额达800多万元,为500余人提供了就业



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陶器。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